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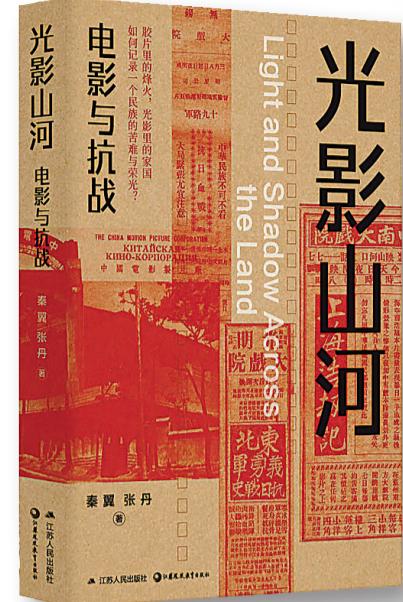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抵抗是全方位的,文化战线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期聚焦两部作品,从不同视角展现了这段历史中的文化坚守。《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通过影像的力量,揭示电影如何穿透战火硝烟,成为点燃民族意识的精神火炬。

《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则聚焦“文军长征”的大学内迁群体,记录师生们带着书籍、仪器,跋涉千山万水,在后方简陋环境中坚持求学、研究的感人故事。这两部作品或以扎实的田野行走,或以缜密的学术思考,共同诠释了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如何通过文化传承守护精神家园的历程,让硝烟中的文化坚守与精神传承,在今天依然焕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

——编者

出版社:2025年1月  
《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秦翼张丹著,江苏人民



在《光影山河:电影与抗战》一书的“余论”中,作者秦翼谦逊地将这部作品称为“还存在许多疏漏的小书”,并坦言其研究“只涉及中国电影历史发展中的一小段”。虽然研究范围有限,但聚焦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意义重大。因为电影是记录时代的重要载体,重新审视那个时期的影片,打捞散落四方的影人故事,正是该书所做的探索。这些工作为我们理解古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浴火重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值此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这部26万字的著作彰显出作者深厚的研究积淀与学术匠心。而这些从历史光影中唤醒的精神与力量,不仅是对过往的致敬,更能照亮当下,激励我们在文化传承中坚守初心,在时代征程中凝聚力量,让那段烽火岁月中的民族韧性与文化自觉,成为今日中国砥砺前行的精神养分。

### 影史流脉的前因后果

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该书的亮点在于,既以全景式“构图”呈现历史全貌,又力图突破陈规,以创新视角展开论述。通览全书会发现:一方面,部分熟悉的事件与人物在新历史观下得到重新阐释;另一方面,大量新史料的补充让历史叙事更具厚度、立体感与生命力。

该书的创新意识与学术价值贯穿各章节。“导言”部分阐明作者的史学观与方法论,强调电影史作为抗战史宏大叙事的重要一页,虽篇幅有限却意义深远,为全书奠定了论述基调。第一章从抗战前中国电影的发轫阶段切入,清晰梳理了抗战电影诞生的前提基础,以及中国电影人为迎接全面抗战完成的准备工作。第二章聚焦“镜头下的抗战”,系统呈现故事片、纪录片等多种影像样态,揭示出这一

## 抗战电影史中的山河故影

□左衡

一部电影史,半部抗战史。电影,远不止是娱乐。它是历史的目击者,是时代的记录簿,更是民族危亡之际不可或缺的精神武器。本书以独特的文化视角重新审视抗战岁月,深刻揭示了中国电影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在文化战线的战场上,电影既是铭刻历史的媒介,更是点燃斗志、凝聚人心的火种,每一部扎根时代的影片,都在光影里复刻着民族的记忆



电影《狼山喋血记》剧照,拍摄时因器材不足,仅有的一部有声摄影机只能在晴天时拍摄外景

时期的电影已突破影院放映的行业局限,延伸至更广阔的社会领域。第三章讲述“大后方”电影业的发展,客观还原了历史全貌。第四章讲述人民电影的筚路蓝缕之路,这部分内容尤为值得关注。在笔者看来,包括电影事业在内的延安文艺,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本土探索,它实现了左翼文学和电影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

第五、六章拨开“历史的迷雾”,聚焦“孤岛电影”的浮沉轨迹,其论述坚守三大原则:一是鲜明的民族立场,即统一战线;二是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复现历史语境;三是在复杂叙事中恪守价值判断的底线。第七章将视野转向东三省及其他沦陷区,深刻剖析敌伪如何在电影领域以“影业对手”为伪装,与我方展开隐蔽而激烈的文化博弈与意识形态角力。“余论”部分则着眼于抗战对中国电影史的深远塑造力,作者提出,1949年后,人民电影成为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其根基皆源于抗战时期对电影业与电影人的淬炼。通过上述层层递进的考察,该书最终确立了抗战电影史独

特的历史叙述框架与评判逻辑。

### 影业钩沉的景深渐显

该书另一突出贡献在于,对电影作为特殊工业形态的自身特点给予了充分关注与深入阐述。电影史写作常聚焦于作品与作者,而一个关键却常被大众忽视或认知不足的事实是:当时的中国工业体系远不足以支撑电影生产。为此,该书系统梳理大量史料,多维度呈现战争对电影工业的宏观影响、不同政治力量推行的电影管理政策,以及战时电影业独特的经营与生产



抗日电影《小玩意》剧照,讲述了被“一·二八”战火摧毁的乡村生活

模式。为增强论述的说服力与研究价值,作者精心制作图表,通过量化分析与直观呈现相结合的方式,清晰勾勒出抗战电影产业的发展脉络。以核心生产资料为例:在抗战烽火下,胶片的来源、获取途径、质量与价格直接关乎电影业的存续。围绕胶片资源,各方力量展开了反复而复杂的博弈与争夺,并迅速蔓延至发行、宣传等环节,实质上演变为一场文化战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延安电影工作者连获取摄影机都需经过更为艰难的政治斡旋与国际援助。

正是基于对电影工业属性的深刻认知,该书得以对抗战时期数量可观的商业片做出更为客观

公允且细致入微的评价。在具体而微的战时文化生态中,商业片既是必要的生存策略,又可能为意识形态斗争开辟出隐秘的空间。孤岛电影便有不少采用“身在曹营心在汉”策略的案例,抗战电影的复杂性与微妙性,恰在这种近乎“潜伏”的叙事中得以生动呈现。

商业片的定位自然催生了类型片的发展。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初期阶段,彼时的类型化探索实则比今人想象更具先锋意识。书中特别提到,甚至科幻片这一类型,都在抗战时期顽强萌芽。此外,伊文思与中国影像的深厚渊源,在国际共运与左翼运动的宏大背景下更显浓墨重彩,为中国电影史有机融入世界电影史脉络提供了关键链接。通过上述层层剖析,该书成功将抗战电影史所蕴含的丰富“景深”清晰而立体地推至读者眼前。

### 影论写作的字里行间

历史的写作,既是一种叙事,又是一种论说。该书在这一点上尤其值得称道。翻阅各章节时,读者常会在字里行间发现作者的史家洞见,进而有所会心。这无疑得益于两位作者多年的思考积淀,他们始终将抗战电影置于更宏阔的历史与文化结构中审视。比如,将鲁迅所译《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及译者附记列为重要文献,论证其对左翼电影评论的影响。又如引述当代学者李零对费穆《孔夫子》的解读,这些都体现出超越电影圈的学术视野与笔力。

再如对古装片的分析,该书在梳理作品与作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其与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基因关联,瞬间打开了理解其文化身份与价值的思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将卜万苍提出的“中国型”视为一种文化身份的自觉、一次艺术范式探索的呼吁,这一判断与我们当下对该问题的认知形成了清晰的呼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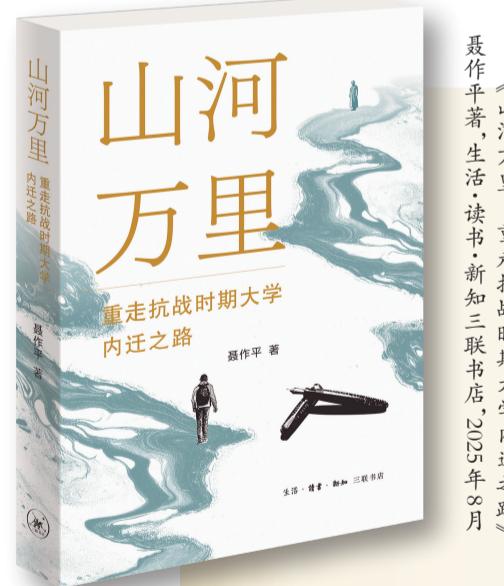
书中还正视了诸多历史遗憾:有些是影史文献的残缺,如纪录片《中国万岁》《延安与八路军》的失传;有些是电影工作者的牺牲,如延安电影团的马似友,英年早逝于东北黑土地。这些遗憾同样构成了抗战电影史不可或缺的部分。

对抗战题材的呈现与主题的开掘,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耀眼的篇章。一代中国电影人用影像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而抗战电影留下的历史遗憾,终究需要当代中国电影人来弥补和超越。

(作者系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 烽火『西迁』路

□聂作平



聂作平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8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北方和东部地区相继沦陷,大批高校被迫转移,形成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学西迁潮。这些高校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砥砺前行,完成了凤凰涅槃般的再生。转移途中及办学期间,师生们留下了众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聂作平自2016年起,选取十所有代表性的西迁高校进行故地寻访,其间参阅大量史料,拜访当年亲历者,最终完成本书。作者力图将田野考察、史料钩沉、历史思索与文学品质熔于一炉,实现思想性与可读性的统一



叶兴中 摄

旧址上新建了浙大西迁广场(又名文庙公园),广场雕塑下,几个不怕热的孩子正在嬉戏追逐。空气中热浪滚滚,不时传来几声枯燥的蝉鸣。宜州城外的标营也是浙大旧址,但其具体位置史料记载不一。次日,向多位老人打听后,我终于在一条两侧长满香蕉和木瓜的小路尽头找到了它,这里在20世纪60年代被改建为医院,80年代废弃,透过一道锈迹斑斑的铁门,能看到一片杂草丛生的废墟。

寻访归来,我开始动笔。2017年9月,《南方周末》用两个整版推出了我的长文《苦难催生奇迹:重走浙大西迁路》,发表后反响强烈,包括《新华文摘》在内的多家报刊纷纷转载。媒体的转载与读者的热议,给了我极大鼓舞,我决定将大学内迁系列继续写下去,于是就有了《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这本书。

促使我持续书写这段历史的,正是其本身蕴含的非凡意义。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率先内迁。此后数年,从中国北方、东部迁往西南的大学数以十计,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流亡兴学”现象。炮火纷飞、世事茫茫之际,年轻的学子与拖家带口的教员,为了信念也为了生存,为了民族也为了个体,依依不舍告别熟悉的故土,踏上迢迢的迁徙之路。他们在异地他乡,以极为简单甚至简陋的方式,度过了一段漫

长而峥嵘的岁月。这段承载着民族文脉延续与文化火种保存的壮阔历史,应该也值得被后人永远铭记。而我选择用文字去追寻和记录,正是希望能为这份铭记贡献一份力量。

继浙江大学后,我寻访的第二所内迁高校是武汉大学。在学者孙雁鸣兄的陪同下,我攀上乐山老城的制高点——老霄顶。站在山上,透过葳蕤草木可以望见急流拍岸的大渡河与河畔的乐山大佛。当年,老霄顶上建有武大礼堂,礼堂下

方的文庙则是武大总部与主校区。岁月涤荡中,当年的旧址旧迹虽已模糊,但那段历史却依旧生动清晰。

从2017年开始,此后8年间,为记录这些内迁大学的往事,我在多个省市往返奔波……山河万里,风霜以行;岁月往事,常令我中宵跋立。还记得那年7月暑热正盛,我从厦门前往长汀的途中,沿途翻越的崇山峻岭,让我自然想起当年厦大师生内迁的艰辛。抵达长汀的那个夜晚,明月在天,我踩着遍地银光,走在灯火稀落的小巷。一只老猫蹲在阴影里,见我走过,忧伤地喵了两声。

在北碚,经当地朋友陪同,我三次寻访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旧址——夏坝。如今,这里仍保留着当年的地标建筑。200米外的大桥下,孙寒冰先生的墓碑上落着两只小鸟,啁啾有声,仿佛在应和桥上飘来的汽笛。

在澄江、罗定、三水、韶关,以及南岭深处的诸多小地方,我追寻着中山大学的蛛丝马迹。那些散落在万里山河间的故人故事,唯有以细心、



乐山文庙内部建筑,原武大乐山办公旧址

杨阳 摄

虔诚与敬意,才能一一打捞、珍藏。在上海、赣州、贺州、友谊关、昆明、宜良,我打听着与同济大学相关的人与事。而在同济内迁的最终目的地——我曾去过多处的李庄,又一个夏天,我与刘火兄顶着烈日走进南华宫、东岳庙、席子巷、羊街,以及不远处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在禹王宫前的老码头旁,熟谙那段历史的刘火兄指着长江告诉我:当年,同济师生就在这里上下船。这是他们抵达的地方,也是他们离去的地方。

通过朋友圈得知我在撰写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一书后,四川大学教师张革女士热情为我引见了一位当年的亲历者——百岁高龄的朱俊岐先生。朱先生与我同为自贡老乡。在成都东门一家茶楼的花园里,我们交谈了一个下午。他曾就读于东北大学和中央大学,是那段历史至今仍健在的屈指可数的亲历者之一,其回忆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这部书的写作动因,始于对年近九旬的竺安先生的采访(如今他也已近百岁)。而写作接近尾声时,我又采访了百岁的朱俊岐先生。两位老人恰好站在这部书的首尾两端。他们既像是那段旧时光在当代的投影,又像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让那些在岁月中渐趋模糊的办学往事,有了可触可感的温度与重量。

(作者系作家)